

郁達夫小說中的病態美學

蔡振念*

〔摘 要〕

在現在中國文學史上，郁達夫是一位創作豐富，影響深遠的作家，他一生寫了許多轟動一時的小說，風格不同的散文，率直坦誠的日記，以及無數的文論和序跋書信。其舊體詩遠紹李杜及晚唐，有人甚至認為成就在其新文學作品之上。郁達夫在他文學活動的三十年間，除了參與創造社，出版創作，更編輯了無數刊物，翻譯德國日本名著多種，可謂著作等身。大陸易幟之後，由於官方所謂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意識形態，郁達夫感傷頹廢的文風，和當道的主流不合軌轍，相關的研究論著為數實在不多。但是，自八十年代以來，隨著風氣的開放，大陸開始注意郁達夫的文學成就，研究的成果也日漸發表。

反觀台灣的郁達夫研究，也許是因為郁氏和創造社及左聯、魯迅等人的關係，這一主題好像成了學術界默認的禁區，也是近年來，學界才漸漸注意到郁氏在小說藝術上的開創之功，以郁氏做為研究專題。如前所述，學界對郁達夫小說的研究從八十年代以來轉趨熱絡，但也有不夠全面及流於泛論的問題，如何深入探討郁達夫五十篇左右的中短篇小說，是現代文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也是在這一課題上的努力和嘗試，試圖探討郁達夫小說中呈現出來的病態美學，並連繫其與郁達夫在性格上和心理上的關係。

關鍵詞：郁達夫、病態美學、自傳小說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緒論

在現在中國文學史上，郁達夫是一位創作豐富，影響深遠的作家，他一生寫了許多轟動一時的小說，風格不同的散文，率直坦誠的日記，以及無數的文論和序跋書信。其舊體詩遠紹李杜及晚唐，有人甚至認為成就在其新文學作品之上，這當然是各人所見，仁智不同。¹郁達夫在他文學活動的三十年間，除了參與創造社，出版創作，更編輯了無數刊物，翻譯德國日本名著多種，可謂著作等身。²因此在郁達夫生前，即有多種有關郁達夫研究的專著，³散見報刊雜誌的評論也不在少數。大陸易幟之後，由於官方所謂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意識形態，郁達夫感傷頹廢的文風，實在和當道的主流不合軌轍，雖然勉強為郁達夫出了選集，也不得不為郁氏頹廢的風格遮掩一番，⁴因此，大陸在郁達夫死後到改革開放之前這段期間，相關的研究論著為數實在不多。反倒是在海外，郁達夫的研究始終受到相當重視，成果頗豐。⁵但是，自八十年代以來，隨著風氣的開放，大陸開始

1 如郭沫若：《郁達夫詩詞抄·序》，載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廣州：廣東花城出版社，1985年），頁162-4；孫百剛：《郁達夫外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劉心皇：《郁達夫詩詞匯編·序》（台北：學術出版社，1970〔1982〕）皆以為郁氏舊詩詞尤勝新小說。據周艾文、于聽編《郁達夫詩詞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統計，郁達夫舊體詩共494首，詞11首。今人蔣祖怡有《郁達夫舊體組詩箋注》（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

2 郁氏所著：《郁達夫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暨香港三聯書店，1982年）共有十二卷。

3 如素雅（李贊華編）：《郁達夫評傳》（上海：上海現代書局，1931年）；賀一波編：《郁達夫論》（上海：光華書局，1932年）；鄒嘯（趙景深）編：《郁達夫論》（上海：北新書局，1935年）。

4 如丁易：《郁達夫選集·序》（北京：開明書店，1951年）云：郁達夫「看出了中國社會的黑暗，卻不知道如何消滅這黑暗，希望中國強，卻不知道怎樣才可以使中國富起來」，因而墮入苦悶的境地。丁易緊著接批評郁氏的作品「對青年們的前進向上的熱忱卻起了一種很不好的消極作用」，成了社會前進的障礙。

5 據張恩和：《郁達夫研究綜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統計，同一時期港台、南洋、日本等地研究論著有250餘篇（部）。

注意郁達夫的文學成就，研究的成果也日漸發表。⁶

反觀台灣的郁達夫研究，也許是因為郁氏和創造社及左聯、魯迅等人的關係，這一主題好像成了學術界默認的禁區，少數相關的論著皆屬生平軼事之類，⁷報紙期刊雖有文章近百篇，但真正觸及其作品藝術成就者寥寥無幾，⁸也是近年來，學界才漸漸注意到郁氏在小說藝術上的開創之功，以郁氏做為研究專題。⁹

八十年代以前，海外尤其是日本對郁達夫研究的熱情，¹⁰和兩岸對郁達夫的冷淡恰成強烈對比。即使在歐美，七十年代開始，已有研究郁達夫的專書或學位

6 如曾華鵬、范伯群著：《郁達夫評傳》（廣州：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許子東：《郁達夫新論》（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王觀泉：《席卷在最後的黑暗中——郁達夫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辛憲錫：《郁達夫的小說創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郁天民：《郁達夫風雨說》（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年）；蔣增福：《眾說郁達夫》（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袁慶豐：《郁達夫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

7 如劉心皇：《郁達夫與王映霞》（台北：大漢出版社，1978年）一書，只是蒐集郁、王交往相關資料加上郁達夫自傳而成書，談不上評論；題名王映霞的《王映霞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年），實際上是丁言昭據訪談記錄寫成；方忠著：《郁達夫》（台北：國家出版社，2002年），作者是大陸學者，也是一本根據郁達夫作品、日記、書信寫成的傳記。

8 比較嚴謹的學術論文有 Chapman Chen, "War and Loss of Love: Yu Dafu's Paranoiad Jealousy" *Tamkang Review* 27.4 (1996, Summer): 525-68; Shu Yunzhong, "The Cost of Living up to the Demand of Autobiographical Fiction: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u Dafu's Fiction and His Life," *Tamkang Review* 33.1 (2002, Autumn): 57-75; 李欽業：〈試論郁達夫小說的美學追求〉《小說與戲劇》1.1 (1979, 11): 121-129; 馬森：〈從寫實主義到現代主義：論郁達夫小說的傳承地位〉《成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篇》32 (1997, 11): 29-42。

9 反諷的是，台灣第一篇郁達夫研究的學位論文是外籍生所撰，A. J. Beare (德利士)：「郁達夫小說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論，1992，145頁），其後有魏福康：「郁達夫小說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論，1993，189頁）和莊貽麟：「郁達夫小說中的愛情觀與女性描寫」（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研究所碩論，2000年，252頁）。

10 研究專著有伊藤丸、鈴木正夫編：《郁達夫資料》（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獻中心，1969年）及其《郁達夫資料補篇》上、下冊（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獻中心，1973-74），小田岳夫：《郁達夫傳》（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年）；稻叶昭二：《郁達夫》（東京：東方書店，1982年）。後二書分別由李平和閻振宇、蔣寅譯為中文，合為一書《郁達夫傳記兩種》（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

論文出現。¹¹

綜觀目前郁達夫的研究成績，仍以生平傳記最佳，小說研究居次，台灣的情況也和整體的研究實況相仿。台灣在郁氏小說研究上比較值得評述如：在德利士開風氣之先的碩士論文中，他能從主題和技巧兩方面切入，從而看到郁氏小說的主題表現了一個轉型期社會零餘者的形象，具有徬徨、空虛和變態心理的性格特徵。郁氏浪漫主義的傾向則表現為對理想美和愛情的追求，但理想和現實的矛盾導致了主人公的痛苦，主人公理想的破滅和對人生感到虛無終使他興起遁世隱居之想。在小說技巧上，德利士認為郁氏利用人物描寫、對環境和氣氛的渲染、情節的特殊安排、象徵手法的應用等來形成一種新的抒情小說。可惜的是，這篇論文僅探討了八篇小說，不到郁氏全部作品的六分之一。魏福康的論文除一章專門介紹郁氏生平外，主要分為創作論和藝術論兩部份，前者從時代背景來看郁達夫小說主題的流變，並依其主題將小說分為三類，總結其特色為自敘色彩濃厚及特重抒情。後者則論郁氏在創作上的散文化手法及技巧上的情節和人物、景物的刻劃。莊貽麟的「郁達夫小說中的愛情觀與女性描寫」除介紹郁氏生平及婚戀外，重點在論述小說中的男女情慾與真愛，次及塑造女性形象的技巧，因為題目有所偏重，也就不是一篇全面來討論郁達夫的小說的論文。Chapman Chen 的論文應用 Melanie Klein 和 Sigmund Freud 的心理分析概念闡釋郁達夫對王映霞有一種偏執的妒忌，而這種心理和郁氏在抗戰時期遭遇母喪及其幼年經驗有密切關係。Shu Yunzhong 的論文則主要在討論郁氏小說的自傳色彩和他生平的關係，從而認為郁氏及其小說表現的女人氣質（effeminacy）和郁氏自我暴露（self-exposure）的性格密不可分。馬森的論文從時代背景入手，認為五四前後寫實主義獨領風騷，郁達夫雖然氣質浪漫，但仍不脫寫實主義的範疇，因此兼有兩者之風格。但更重要的是郁達夫作品中的現代主義成分。其作品中所呈現的個性解放及孤絕的氣氛，跟現代主義小說中的疏離感如出一轍。郁達夫最喜歡用的自剖，除了浮現著佛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痕跡，在技巧上也非常接近意識流的「內在獨

11 如 Randall Oliver Chang (1945-) "Yu Ta-fu (1896-1945): The Alienated Artis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h. D diss., Claramont Graduate School, 1974; 捷克漢學家 Anna Dolezalova, *Yu Ta-fu: Specific Traits of his Literay Creation* (New York: Paragon, 1971)。前者後來由何欣、張聲肇譯為《一個與世疏離的天才——郁達夫》(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

白」。馬森認為郁達夫所表現的前衛色彩，使他在文學的傳承上成為從寫實主義過渡到現代主義的一座重要橋樑，下開以後「內視小說」的先河。馬森所論不為無據，但郁達夫文學或小說的滋乳者大都為德國、日本和俄國作家，他所親炙的歐美作家則多為浪漫派如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愛默生（Ralph Emerson, 1803-1882），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1817- 1862），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再有就是性格和他極為相近的璫生（Ernest Dowson, 1867- 1900）。¹² 試看郁達夫曾為文介紹盧騷的生平及思想創作，對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 1818-1883，）也情有獨鍾，而這些作家都是前現代主義的文人，因此我們僅能說郁達夫小說中的現代主義成分是一種偶合，他作品中的孤絕與疏離恐怕來自屠格涅夫筆下零餘者的影響成分居多。

如前所述，學界對郁達夫小說的研究從八十年代以來轉趨熱絡，但也有不夠全面及流於泛論的問題，如何深入探討郁達夫五十篇左右的中短篇小說，是現代文學研究上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也是在這一課題上的努力和嘗試，試圖探討郁達夫小說中呈現出來的病態美學，並連繫其與郁達夫在性格上和心理上的關係。

二、郁達夫小說中病態美學的呈現

評論者言及郁達夫小說時，總會注意到他作品裡所表現出來的孤獨、頹廢、病態的傾向，換言之，郁氏小說有一種以病態為美的頹廢美學，這種病態美學的藝術手法，在當時被認為是中國文學上的先鋒，在傳統小說中是少有的。事實上，頹廢（la décadence）在西方早就是一種明確的藝術表現，可以追溯到猶太基督教信仰中的末世觀念，¹³也和後來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

12 在〈銀灰色的死〉英文附記中，郁達夫特地說明小說取材自 R. L. Stevenson（1850- 1894）的 *A Lodging for the Night* 及 Dowson 的生平。另郁氏有篇文論〈讀了璫生的譯詩而論及于翻譯〉載《郁達夫文集》卷五，頁 189-196，文中指出王統照所譯 Dowson 詩的錯誤，可見郁氏對 Dowson 作品極為熟習。

13 參見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alinescu 認為頹廢的反面其實是發展，它是現代性的一種面向。

以醜為美的主張有關，雨果為了對抗古典主義的崇高美（sublime），提出「醜就在美的身邊，畸形靠近著優美」的說法。後來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深受雨果影響，他的詩集《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 1857）即是試圖從一個醜陋和壓抑的世界中去尋求秩序和美麗。¹⁴所以就頹廢美學表現的現代性而言，它也是美學上的先鋒主義。波特萊爾的詩和文學曾被廚川白村《苦悶的象徵》所引用和介紹，後來魯迅又將廚川的書譯為中文，¹⁵以郁達夫留學日本多年的經歷及他和魯迅的交情，¹⁶如果我們說郁達夫小說中的頹廢和病態的美學，受到西方類似思潮的影響，似乎是個合理的推論。¹⁷郁氏小說中的病態美主要藉人物的形象表現出來，這種病態的人物可大別為身體上的病態與心理上的病態，以下分別論述這兩類人物的形象。

（一）身體上病態的人物：

郁達夫小說中的許多人物，都具有瘦弱、有病在身的生理特徵及敏感、憂鬱、神經衰落的心理特徵，這正是郁達夫真實個體在小說中的鏡像，無怪乎他的作品每被視為自敘傳，如同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5）在《疾病的隱

14 波特萊爾在觀念上雖受雨果影響，但他的美學理論則源於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和拉瓦特（Johann Caspar Lavater, 1741-1801），參見楊冬著：《西方文學批評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90-395；郭宏安譯：《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15 見《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十三卷。

16 郁達夫可以說是最了解魯迅的人及著作者之一，他有關魯迅的文章多達二十餘篇，七萬餘字。參見許鳳才：〈徬徨吶喊兩悠悠——郁達夫論魯迅〉《浪漫才子郁達夫》（開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97-217。

17 郁達夫在〈海上通訊〉這篇散文中提到，有一次何畏對他說：「達夫，你在中國的地位，同佐藤〔春夫〕在日本的地位一樣。」郁達夫的反應是感到慚愧，以為以目下中國的環境，想以作家立身，連 Victor Hugo 也無希望，可見雨果在郁氏心目中的重要性。文見《郁達夫文集》卷三，頁71-77，因此，郁達夫的美學觀受到雨果的影響是很自然的事。另外，西方在1853年就出現了諸如 Karl Rosen Kranz 的《醜的美學》，見楊小濱著：《否定的美學》（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頁148；楊小濱又指出，近代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在其《美學理論》中揭櫫了：「正是通過醜的原因才達到了美的結果。」因此，現代藝術中醜的形象正是美的另種表徵。見同書，頁149。

喻》一書中所指出的，疾病表現了病人的性格，¹⁸郁達夫小說中生理或心理上的病態人物，正是他自我的摹寫（self-portrait）。

郁達夫的第一篇小說〈銀灰色的死〉在 1921 年寫於日本，被認為是自傳色彩濃厚作品。小說一開始，主人公醒自東京的雪後：

在黑漆漆的房內的光線裡，他的臉色更加覺得灰白，從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顴骨，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窩看來，他卻是一個清瘦的人。¹⁹

灰白的臉色和瘦弱的身體，似乎正預告了主人公 Y 君的悲劇。²⁰Y 君在故鄉的妻子已死去，他日日到酒館尋醉，暗自喜歡酒館主人的女兒靜兒，但靜兒已要出嫁，無望之餘，Y 君酒後橫死在東京街頭，被當成無名屍，貼出的公告說這名「行路病者」是死於腦溢血。

主人公瘦弱的形象似乎和他頹廢的人生完美的搭配在一起，瘦弱給人一種身心有病的聯想，也和敏感、憂鬱、詩人的性格密不可分，法國詩人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曾經說過：「我不能接受體重超過 99 磅的抒情詩人。」²¹而正是戈蒂埃用了著名的頹廢風格來分析波特萊爾的《惡之花》詩集。²²如前所言，波特萊爾以醜為美的特殊美學觀和他以頹廢為崇高的藝術手法正隨同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風潮，影響了五四一代的文人。因此，郁達夫小說中主人公多病瘦弱的形象，除了是自我寫照外，不能說不是和浪漫主義尤其是波特萊爾有關。

18 蘇珊·桑塔格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台北：大田出版社，2000），頁 56。桑塔格指出，十九世紀時疾病吻合病人性格（disease fits the patient's character）為疾病表現性格（disease expresses character）所取代，但不管如何，這兩種觀念都說明了疾病和性格間的密切關係。

19 郁達夫：《郁達夫文集》卷一，頁 2。此後凡引郁達夫作品，為省煩瑣，僅在引文末註出卷數及頁碼，並以簡式表示，如本處引文標註為 1：2。

20 郁達夫姓的英文縮寫正是 Y，他的學名是郁文，所以他小說中的 Y 君、文樸、于（郁）質夫等主人公每被視為自身的影子。

21 轉引自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 40。

22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pp. 164-5

另外，郁達夫一些短篇之作，主角或其中的某些角色也都是體弱多病，如〈楊梅燒酒〉一開篇，主人公「病了來年，足跡不曾出病房一步。」（2：146）〈血淚〉中的主角在異鄉飄泊十年，只有在有病時候回中國來小住；小說一開始，主角又害病回到故鄉，沒想到初抵上海，竟因飢餓和衰弱的緣故而暈倒，患了貧血之病。（1：173-180）〈瓢兒和尚〉起筆，敘述者因為生病之故，空閑無聊的日子裡，在杭州附近尋幽研讀古籍。（2：368）被認為自傳小說的〈離散之前〉，其中的霍斯敬因為染病住在上海調養，而主角于質夫對自己的病更有一種命運未卜的惶惑：「我的病，經過冬天，不知要起如何的變化。」（1：273）毫無疑問，于質夫和〈過去〉的主人公，〈煙影〉、〈東梓關〉中的文樸得的都是肺病。在〈過去〉中，主人公在兩三年中東飄西泊，沒有一處住過半年，在無聊之極，把苦悶藉小說寫出來，然而卻不幸得了呼吸器的病症。（1：380）〈煙影〉中的文樸想回故鄉，因為咳血咳得厲害，加上稿費不豐，只得在上海一間破落的前樓住下，每天無情無緒地在馬路上孤獨的漫步。（1：361）〈東梓關〉中同名的主角從長年漂泊的倦旅歸來，為了是治療吐血病。（2：308）〈遲桂花〉中的翁則生回憶當年因為咯血和主角一起在日本房州避寒，遇到了同樣患有肺病的日本少女真砂子。（2：320）讀者應會記得，翁則生除了肺病，同時患有神經衰弱症，郁氏筆下的人物，往往在身體的病殘外，兼有心理孱弱的問題，最典型的當然要數〈南遷〉中的主人公伊人，伊人因為肺病，說起話來有一種梅蘭刻烈（Melancholy，引者注，憂鬱）的餘音，外國朋友勸他到鄉下靜養，轉換空氣，因此才到了安房半島此地。

雖然沒有地中海內的長靴島的風光明媚，然而成層的海浪，蔚藍的天色，柔和的空氣，平軟的低巒，海岸的漁網，和村落的居民，也很具有南歐海岸的性質，能使旅客忘記他是身在異鄉。若用英文來說，便是一個 Hospitable, inviting dream, land of the romantic age（中世浪漫時代的，鄉風純樸，山水秀麗的夢境）了。（1：54）

可以說，郁氏筆下人物以患肺病者居多，而患者大多是文人或作家，帶有一

種虛無、頹廢、憂鬱的人格特質，這當然是郁達夫的自我寫照，²³但我們不要忘了，這也是一種時代病和時代風氣。

肺病一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因藥物的發明才得到控制，十九世紀是肺病最流行的時代，許多文人作家都曾染上肺病，尤其是浪漫主義的詩人。而浪漫主義被引介到中國之後，深刻地影響了五四一代的文人，²⁴李歐梵甚至稱五四的作家為浪漫的一代，就是因為五四作家大都受到西方浪漫派影響，發現了個人並且勇於追求自我、表現自我。浪漫派重要作家大部份在此時被引介到中國來，如歌德（Joha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雨果、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華滋華斯、盧騷、海涅等是。而作家中像尼采、梭羅、愛默生、史蒂文生、紀德（André Gide, 1869-1951）、湯瑪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曼殊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屠格涅夫、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都是肺病患者。郁達夫作品中曾多次提到以《金銀島》（*Treasure Island*）小說著名的史蒂文生，他在〈銀灰色的死〉英文附記中說此作是因為讀了史蒂文生的 *A Lodging for the Night* 之故。除了撰有《盧騷傳》外，他還有〈盧騷的思想和他的創作〉、〈關於盧騷〉等文，並翻譯了盧騷死前之作《一個孤獨漫步者的沉思》。對於深受尼采哲學影響的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也有〈蕭伯納與高爾斯華綏〉、〈介紹蕭伯納〉等篇章。郁氏筆下的零餘者，其靈感當然是來自屠格涅夫，所以他有〈屠格涅夫的《羅亭》問世以前〉、〈屠格涅夫的臨終〉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小說〈沈淪〉中，他則屢次提到愛默生、梭羅、尼采、海涅、華滋華斯等浪漫派作家，其中多人都是肺病患者，這當然不是巧合，而是郁達夫在這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像。

郁達夫小說中的浪漫抒情風格，論者多有評述，²⁵此處不贅，所可論者，郁

23 在真實生活中，郁達夫患有肺病，且時時到鄉下或家鄉富陽養病，可參見郁雲：《郁達夫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及郁氏散文及日記、書信，《郁達夫文集》卷三、四、九。

24 參見 Leo ou-fan Lee（李歐梵），*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5 如陳國恩：《浪漫主義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頁 72-77；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二、四章；楊

氏小說中人物都有身體上的病態，尤其是肺病，恐怕也和西方浪漫主義作家的影響脫不了干係。

肺結核在浪漫主義之前，早就被視為一種燃燒熱情的象徵，用來折磨熱情過度的人，浪漫主義者更視肺結核為一種愛情之病，濟慈在 1820 年寫信給摯愛的芬妮·布朗說：「如果我有自結核病中復原的機會，這熱情會殺了我。」²⁶在浪漫主義者看來，肺結核造成的死亡雖消解了肉體，但卻美化了人格，身染肺病的梭羅在 1852 年寫道：「死亡和病經常如此美麗，如……肺結核的熾熱光輝。」²⁷屠格涅夫小說《前夕》（*On the Eve*）中主角因沙洛夫，革命流亡無法返鄉，竟因而挫折生病，得結核病而亡。結核病因此引起一種崇高的情感，它不再是浪漫詩人的發明，而是一種普遍態度，「死於結核病的人確實被視為具有浪漫人格。」²⁸肺病甚至被認為是一種靈魂病，肺病的殘酷美學帶給患者的是虛無和感傷，根據桑塔格的說法：

但必須是敏感的人才能受到此等悲傷，或必須是敏感的人才能得結核病。結核病神話構成古老憂鬱概念長遠歷史中重要的情節——根據四體液論（theory of the four humors），結核病是藝術家的病。憂鬱的人——或結核病患者——是優越的人：敏感、富創造力、與人疏離。濟慈和雪萊可能深受結核病之苦。但雪萊安慰濟慈「此肺病是一尤其喜歡如你這般寫好文章的人的病……」。連結核病與創造力的陳腔濫調是如此根深柢固，以至於在十九世紀末有位評論者指出，是結核病的逐漸消失造成當前文學／藝術衰退。²⁹

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郁達夫小說中的主人公，在疾病之外，總是帶有一種憂鬱的性格，讀者應該不會忘記，〈沉淪〉一開始，主人公在覺得孤冷得可憐之餘，

聯芬：《中國現代小說中的抒情傾向》（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年），頁 545-578。

26 引自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 30。

27 引自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 24。

28 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 41。

29 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 43。

捧讀的正是浪漫詩人華滋華斯的作品以及深受歐洲浪漫主義影響的愛默生和梭羅的散文，華氏作品中，郁達夫又特標出一首“The Solitary Reaper”（孤寂的收穫者）來映照己身的淒清，這淒清和他的 hypochondria（憂鬱症）一般，正一天一天的增加。（1：21）郁氏在談到〈沉淪〉的寫作背景時說：

人生從十八九到二十餘，總是要經過一個浪漫的抒情時代的，當這時候，就是不會說話的啞鳥，尚且要放開喉嚨來歌唱，何況乎感情豐富的人類呢？我的這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慘酷，軍閥掌權的島國裡過的。眼看到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的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所歷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同初喪了夫主的少婦一般，毫無氣力，毫無勇毅，哀哀切切，悲鳴出來的，就是那一卷當時很惹起了許多非難的《沉淪》。（〈懺餘獨白〉，7：250）

這就讓我們聯想到疾病和性格的關係了。肺病和憂鬱症的聯想，我們早已耳熟能詳，瑪莉·巴希克特塞夫（Marie Bashkirtsev）在她的日記中寫道：「結核病非但不使我看來醜陋，反而賦予我一種非常合適的鬱悶氣息。」³⁰卡夫卡認為自己的肺病不過是精神病的溢流，濟慈、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契訶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布朗特（Emily Bronte, 1818-1848）的肺病則被人認為是人格特異和適應不良的症候。

治療肺病的方式在抗生素發明之前一直是靜養和隔離，前文已言及，郁達夫在〈南遷〉中的主人公伊人，因肺病才到環境幽美的房州靜養。〈煙影〉和〈東梓關〉中的文樸，因為咳血回到鄉下養病，當然也是肺結核。我們看被視為湯瑪斯曼自傳性小說的《魔山》（*The Magic Mountain*），主角也是因肺病到山中溫泉治療；尼采因為養病孤單地住在阿爾卑斯山上，才動筆寫起《察拉圖斯特拉》（*Thus Spake Zarathustra*），而《沉淪》中的主角不是自覺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自比為 Zarathustra 嗎？郁達夫體弱多病，時時養病鄉下，我們下文會細論，這裡要指出的，是郁氏作品中病態的主人公，必定有來自浪漫主義作家及作品的影響，殆無可疑。浪漫主義作家濟慈曾被醫生勸告搬到

30 引自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 40。

羅馬，史蒂文生選擇到太平洋沿岸生活。遠離城市到氣候較佳的地方生活，被認為有助肺結核的痊癒，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郁達夫小說中主人公大多有著波希米亞氏的生活方式。〈遲桂花〉中流浪東京的翁則生要等到回到故鄉翁家山之後才有健康的身心，也贏得了遲來的婚姻幸福，猶如桂花遲開久香。〈春風沉醉的晚上〉的主人公因病，半年之內遷居了三次。（1：237）但也因為疾病，翁則生才會回到健康幽美的家鄉，伊人才會到浪漫的安房半島，文樸也才有機會親炙、了解故鄉的人物與風景。醜惡的疾病帶來的是優美的自然環境與文學作品。美與醜並存，病態之中讓人發現了另一種美學。史蒂文生曾言：「當健康遺棄我們時，我們被送往的地方經常是相當美麗的……我敢說當病人得到放逐判決時他不是非常傷心的，反而視他的壞健康為幸運事。」³¹如同雨果和波特萊爾的作品所顯示的，這世界醜和美不是對立而是和諧共存，在惡之中我們也同時發現善與秩序，在憂鬱之中生命才顯示其崇高的面相，對郁達夫作品中的病態之人物，我們也應作如是觀。

（二）心理上病態的人物

雖然郁達夫小說中的角色，在身體的病態之外往往也兼有心理上的病態，有時難以區分何者是因，何者是果，我們也知道，身心的疾病往往是相互關聯的（psychosomatic），但郁氏小說中有些人物確實具有典型的心理病徵，經常表現為神經衰落、失眠、憂鬱、空虛、孤獨等症候，反映出一種世紀末的時代病和頹廢的人生觀，其極端則為性變態或同性戀等外顯行為。

〈南遷〉中的伊人，除了肺病之外，伴隨他的是憂鬱（melancholy）的氣質，他把自己心理上的苦，比做雨果《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中主人公精神上的苦（1：96）。〈空虛〉中的于質夫患有失眠，離開東京租屋住於東中野，想起五年前暑假在湯山溫泉遇到同是神經衰弱而來養病的少女。于回國後住在上海，因失業無聊而感到生命的空虛。在〈茫茫夜〉中于質夫和同是瘦弱的吳遲生發展出了一段似有若無的同性之戀，吳因患有肺病，從北京來到南方的上海過冬。到了續篇〈秋柳〉，于質夫去了 A 地教書，卻因學校學潮感到悲憤、無奈，投身於

31 引自桑塔格：《疾病的隱喻》，頁 47。

妓女海棠，又認識了貌似吳遲生的碧桃。小說結束，于回到上海，寄望能找到吳遲生。〈春風沉醉的晚上〉，敘述者「我」每年在春夏之交都要發神經衰弱的重症，而小說開始時，「我」已因失眠和營養不良成了病的狀態。〈落日〉中的 Y，神經過敏，在上海乘坐電車、人力車，到處怕人認出，驚恐不已（1：262）。〈迷羊〉中的敘述者因為腦病在 A 城養病，他在大學時就因用功過度而患失眠，故事結束，「我」的神經衰弱已到了極點。

這麼多的角色都有心理上的問題，尤其大多為神經質的人物，我們只能說，這恐怕是郁達夫的夫子自道，斯人而有斯疾。郁氏在一篇〈文藝賞鑒上之偏愛價值〉中談到文藝上一種心理的偏愛。

與神經衰弱症，世紀病，有一同的原因，大凡現代的青年總有些好異，反抗，易厭，情熱，瘋狂，及其他的種種特徵。因這幾種特徵的結果，一般文藝愛好者，遂有一種反對一般趣味，走入偏僻無人的路裡去的傾向，偏愛價值就於是乎出生了。（5：160）

在另一篇名為〈小說論及其他〉的文章中又說：

文人的多病，是以科學的眼光來看，也可以說得通的。他的神經比常人一倍的靈敏，感受力也比常人一倍的強，所以他常常離不了「自覺」（self-consciousness）的苦責。神經纖弱的人，旁的身體方面是不會發達的。中國人每以多愁善感來形容文學家，實在古今中外多是一樣的。（5：235）

在談到〈日記文學〉時，他特別舉出德國作家 Henri Frederic Amiel（1821-1918）為例，因為 Amiel 是一位憂鬱病患者，懷疑自己及世界的一切，過度的敏感使他痛苦不堪，1851 年 4 月 6 日，Amiel 的日記寫道：

總之不可救藥的一切，只是使我憂悶，使我苦痛，我的幻想太發達了，思想太精細了，自覺太英敏了，總之是我的性格不強的原故，所以弄得現實的生活，實際生活，與我兩不相入。（5：264）

1861 年 3 月 17 日又云：

今天午后，對於死的熱望，燒滿了我的全身，厭惡之情，生的厭倦，不斷的苦悶，征服了我的心身……到墓地裡去徘徊，或者可以得到一點安慰，然而也不能夠……（5：265）

郁氏會刻意強調 Amiel 的敏感與苦悶，想來是因為他自己感同身受，兩人性格上的雷同之故。我們看郁氏和王映霞之間的一段婚戀，最後導致離婚收場，主要原因在於郁達夫敏感多疑的個性，使他懷疑王紅杏出牆，另一方面郁在和原配孫荃離婚後，又時時回富陽探視並同居，也引起王的不滿，優柔寡斷的個性正是神經質人格的特徵，³²也造成郁達夫自身婚姻的悲劇。³³

前文已提到，郁氏〈銀灰色的死〉序文提到該篇之作是因為 Ernest Dowson 之故。在〈集中于《黃面志》（The Yellow Book）的人物〉一文中，郁達夫再次提到這篇小說及 Dowson 的人及作品：

The Yellow Book 一的群天才詩人裡，作最優美的抒情詩，嘗最悲痛的人生苦，具有世紀末的種種性格，為失戀的結果，把他本來是柔弱的身體天天放棄在酒精和女色中間，作慢性的自殺的，是薄命的詩人 Ernest Dowson。

Ernest Dowson 的詩文，是我近年來在無聊的時候，在孤冷憂鬱的時候的最好伴侶。我記得曾經在一篇小說裡，把他的性格約略描寫過的。（5：172）

和 Dowson 一樣，郁氏喜歡醇酒美人，不時嫖妓，但也和 Dowson 一樣，他的漁色，正是他的愛的昇華，他的頹廢，正是他的崇高。³⁴他的性愛其實是他

32 見齋藤茂太著、金初政澤：《神經質的人》（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78 年），頁 10-13。

33 有關郁王婚姻關係的心理分析，詳見 Chapman Chen，前揭文。

34 郁氏在追求王映霞之時，卻也周旋於上海許多已婚或寡居的婦女間，更是時時召妓，他一面和王映霞沉醉在純潔而神聖的性靈之愛中，一方面卻也迷戀肉體之歡，但兩者在他身上卻奇

苦悶的象徵，在介紹 Amiel 失戀於 Cynara 的一段文字中，郁達夫說 Amiel：

他去近醇酒婦人，正是他對他情人的忠節，跟了群眾，旋轉回舞，撒著薔薇，想忘記他情人的同白百合似的影子，但是終於不能。想用了狂噪的音樂，強烈的酒來忘記他情人的影子，但一到了酒闌燈炮，他終究忘不了他的舊情，綿綿的長夜，仍不得不為情思所苦。(5：180)

我們或許也可以說，郁達夫小說中主人公心理的病態，也經常如同 Amiel 一樣，轉為性變態的徵候或放縱的性行為，而這些外顯的病態行為，實導因於內心的苦悶和抑鬱。〈秋柳〉中的于質夫在 A 地感到前途茫茫，心靈的空虛使他投身妓館，〈沉淪〉中的主角在異國戀愛無成，身為弱國子民的自卑，性慾的沒有出路，使他轉為窺浴的窺淫癖患者 (scopophilia)。³⁵雖然蘇雪林在〈郁達夫論〉中指郁氏所表現的性苦悶帶著強烈的病態，是一種色情狂 (Satyriasis)，³⁶但我覺得錢杏邨更為有見，他認為郁氏作品中的性苦悶，有生理上的原因，也有意志被壓抑及家庭、婚姻、社會問題苦悶的原因。³⁷郁氏自己在一篇〈關於小說的話〉指出，現代小說：

表現人生，務須拿住人生最重要的處所，描寫苦悶，專在描寫比性的苦悶還要重大的生的苦悶，因為性欲不就是人生的全部。人的一生，在男女的性交之外，重要的事情還不知有多少。(6：86)

妙的形成一種矛盾的和諧，這也是郁氏時時被批評為墮落文人的原因。可參見郁達夫 1927 年 1 月以後的日記，《文集》卷九，頁 34 以下。

35 佛洛伊德指出孩子會以偷窺父母性愛來進行主體建構，後來拉崗 Jague Lacan 以鏡像理論來區分自我和父母，但女性主義者則將偷窺 (voyeurism) 視為男性物化女性的行為，參見 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郁達夫也是個窺淫癖患者，曾偷窺王映霞洗澡，見 Chapman Chen, 前揭文，頁 526 以下。

36 見陳子善、王自立編《郁達夫研究資料》，頁 66-77。

37 錢杏邨：〈達夫代表作後序〉，收入陳子善、王自立編，前揭書，頁 32-53。

可見性的苦悶或變態只是郁氏表現生之苦悶的一種手段。但我們也不可否認，郁氏偏愛以性的苦悶或放縱來凸顯其頹廢的風格，在〈文藝賞鑒上之偏愛價值〉中他提到：「性欲和死，是人生的兩大問題，所以以這兩者為材料的作品，其偏愛價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5：162）這種題材上的偏愛，加上其感傷、虛無的情調，使他的作品充滿世紀末的頹廢氣氛：

人生終究是悲苦的結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樂的兩字。人家都罵我是頹廢派，是享樂主義者，然而他們那裡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著的被金錢買來的肉體，我的哀愁，我的悲嘆，比自稱道德家的人，還要沉痛數倍。我豈是甘心墮落者？我豈是無靈魂的人？不過看定了人生的運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蕙蘿集自序〉，7：153）

在這一篇自序裡，郁氏為自己和作品的頹廢作了有力的辯白，在他看來，沉淪是為了要昇華，肉體上的享樂恰是精神的痛苦，頹廢是因為太過清醒，如同魯迅的〈狂人日記〉，在瘋狂之中才能看清中國社會的腐敗，清醒了，反而加入了吃人的墮落行列。在郁達夫病態的人物中，誰能說不正是因為他們是清醒的人，看出了時代的無出路、看出了性道德的虛矯，才放達於頹廢與病態的性愛中，而正是在這種病態之中，郁達夫要我們去賞味出他的率真與美感，去體會另一種美學。

（三）病態人物的自傳色彩

郁達夫曾經說過：「我覺得，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7：186）又在〈日記文學〉中說：「我們都知道，文學家的作品，多少帶有自傳的色彩的。」（5：261）「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這句話本是法國作家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的一句名言，郁氏意到筆到，許多作品都有自傳性質，在《達夫自選集·序》中他提到：

《離散之前》、《煙影》，或係同一格調。但悲懷傷感，決不是一個人的固

有私情，照托爾斯泰的藝術論來看，則感情的渲染傳流，卻是藝術作品的主要功用之一，是以不避自敘傳的嫌疑，仍選入。(7:255)

郁氏自傳的作品，自是不僅止這兩篇，夏志清指出：

「沉淪」雖然用的是他敘法，實在是露骨的自傳。作者家庭和教育背景幾乎是一樣的，故事說來頭頭是道。這樣說來，郁達夫的全部小說都是盧梭式的自白，例外很少。³⁸

郁達夫創造社的朋友鄭伯奇也說：

恐怕作者從來作品的全部，都是作者自己生活的敘述。《茫茫夜》諸篇不用說了，就是《十一月初三》等之類，雖然事實的敘述少，心境的描寫多，然而性質上當然還是自敘傳一類的。《采石磯》一篇是寫薄倖詩人黃仲則的，然而作者所描寫成功的黃仲則，乃是作者自己的性格的投影。黃仲則的心情，就是作者的心情；黃仲則的言論，就是作者的言論。³⁹

郁達夫自傳式的作品，其實是五四時代個性解放、重視個人情志表現的極致。正因為他敢於藝術化的坦露生活和內心隱秘，所以他的小說被視為是五四時期個性主義最坦率的藝術宣言。⁴⁰

郁達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如前所言，大都是身體或心理上病著的社會零餘者 (superfluous man)，這種零餘者形象受到俄國小說，尤其是屠格涅夫《零餘者的日記》的影響不言可喻。郁達夫除了為文介紹屠格涅夫生平及作品外，他自己

38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頁90。

39 鄭伯奇：〈寒灰集批評〉，收入嚴家炎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卷二，頁467。郁達夫在一篇〈關於黃仲則〉的文章中提到，黃仲則是位多愁多病的詩人，壯年死於肺病，《文集》卷六，頁115；以鄭伯奇對郁達夫的交情和了解，他說〈采石磯〉中的黃仲則就是作者的投影，不為無據，我們不要忘了，郁達夫和黃仲則一樣是位肺病患者。

40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卷一，頁548。

也熟讀《零餘者的日記》達三次之多，並且「愈嚼愈有回味。」，⁴¹在〈屠格涅夫的《羅亭》問世以前〉，他又談到：

在許許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國作家裡面，我覺得最可愛、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會生厭的，便是屠格涅夫。這在我也許是和人不同的一種特別的偏嗜，因為我的開始讀小說，開始想寫小說，受的完全是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點憂鬱，繞腮鬚長得滿滿的北國巨人的影響。（6：176）

我們應該不會忘記屠格涅夫也是個肺病患者，他筆下的零餘者和郁氏作品中孤獨、虛無、頹廢的角色如出一轍，郁氏有篇散文，題名就是〈零餘者〉（3：84-90），而其小說作品中，這種身心皆病的零餘者時時出現，〈秋柳〉中于質夫向碧桃訴說自己的身家，和真實生活中的郁達夫一般無二，于質夫留學日本，最後只拖了一個「半死的身體回中國來。」小說最後，于質夫甚至覺得自己是「世上最孤獨的人了」。（1：334）在真實生活中，郁達夫也處處表現出頹廢的零餘者心態，在給郭沫若的一篇〈北國的微音〉中，他對郭氏說：「我覺得人生一切都是虛幻，真真實在的，只有你說的「淒切的孤單」，倒是我們人類從生到死味覺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實味。」（3：92）在〈感傷的行旅〉一文中，他自承：「老是自傷命薄」，是對人世不滿的時代落伍者。〈還鄉記〉散文中，他對自己的認知是「人生戰鬥場上的慘敗者」及「逃亡途中的行路病者」（3：32）。

對照郁氏的傳記，我們發現郁達夫如同他作品的主人公，在身體上病弱不堪，在心理上敏感而神經質，他長期的朋友郭沫若曾說他神經太過纖細，又說他「身體太弱，似乎在二十幾歲的時候便有了肺結核」，另外，就是心理上自我作賤，愛喝酒，愛抽香煙，愈不得志愈想偽裝頹廢，到後來日漸消磨，遇事退縮。⁴²郭氏的觀察對照郁達夫的自敘，可謂密合無間，在〈寫完了《蕙蘿集》的最後一篇〉中，郁氏自云：

自去年冬天以來，我的情懷，只是憂鬱的連續。我抱了絕大的希望想到俄

41 〈永明樓日記〉，9：193。

42 郭沫若：〈論郁達夫〉，載陳子善、王自立編，前揭書，頁84-93。

國去作勞動者的想頭，也曾有過，但是在北京被哥哥拉住了。我抱了虛無的觀念，在揚子江邊，徘徊求死的事情也有過，但是柔順無智的我的女人，勸我終止了。清明節那一天送女人回了浙江，我想于月明之夜，吃一個醉飽，圖一個痛快的自殺，但是幾個朋友，又互相牽連的教我等一等。我等了半年，現在的心裡，還是苦悶得和半年前一樣。

活在上世，總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勢後的我這零餘者，教我能夠做些什麼？（7：155）

退縮的心理殘疾，使他時時尋求遁世，因此偏嗜隱士的文學作品，自言「和我周旋得最久，到現在也還是須臾不離的，是美國的那位肺病哲學家 Henry David Thoreau 的六七冊著作。」（〈靜的文藝作品〉，6：208）甚至把梭羅的《湖濱散記》讀了三、四遍以上。

我們看到，郁氏小說的主人公大都和他一樣，神經質而又體弱多病。郁氏也在作家、作品中不斷尋求自己的影像和認同，所以嗜讀的作家，不是同樣患有肺病的屠格涅夫、史帝文生、梭羅等人，就是和他一樣神經過敏的璫生。郁氏留學日本時就已有肺病，1920年7月他回國和孫荃結婚，新婚之際又染上瘧疾，病了十餘日才痊癒，這場病使他更加悲觀。1921年6月，郁達夫因胃病住進了東京駿合台杏雲病院，治療了一個多月才出院。1925年底，郁達夫辭去武昌師範大學教職，回到上海籌辦創造社出版部，卻因肺病復發，咯血而入療養院，直到次年二月才出院。1930年，郁達夫一度病得很嚴重，除了肺病咯血外，更有黃疸，夜間盜汗，使他食不下嚥，骨瘦如柴。幸好當時有王映霞悉心照料，王託母親從杭州給郁達夫帶來十多隻旱鴨子進補，但郁達夫畢竟底子太弱，1932年10月，肺病又復發，移到杭州西湖醫院療養。甚至到了郁達夫生命的晚期，仍然不能免於疾病的困擾，1942年，他在蘇門答臘為日本憲兵隊強徵為通譯，次年二月，因肺病之故才得已辭去職務。⁴³

由此可知，郁氏筆下的人物確有作者的映像，但這並不等於說，小說就是自傳，美國芝加哥學派的批評家布斯（Wayne C. Booth）在《小說修辭學》（*The*

43 參見郁雲：《郁達夫傳》，方忠：《郁達夫》，袁慶豐：《郁達夫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桑逢康：《郁達夫傳》（台北：新潮文化出版社，1996年）。

Rhetoric of Fiction) 一書中提出「隱含作者」(implied author)的觀念,認為作者會在作品中創造一個第二自我,布斯稱之為隱含作者。⁴⁴隱含作者的觀念讓讀者時時記得:文學作品永遠是虛構和想像的,和真實人生有一定的距離,現實也必得藝術化的呈現,才能轉化為文學的題材。但無論如何,我們仍可以說,郁達夫小說中的人物,其形象每有他自我意象的投影,是郁達夫藝術化了的自我。

三、結論

本文從檢討學術界郁達夫的研究出發,進而申論郁達夫小說中病態人物所呈現的美學,在頹廢與虛無之中同時有一種昇華和崇高,其源頭應是受到西方浪漫主義作家作品的影響,浪漫派的美學中,每有一種美醜共存或或以醜為美的現象,雨果的《悲慘世界》就是一個例子,受到雨果影響的法國詩人波特萊爾及其他頹廢派詩人,認為藝術要表現人的心靈,特別是憂鬱痛苦的心情。波特萊爾認為美是同時滿足感官並引起愁思的東西,他的《惡之花》詩集在描寫醜惡病態的同時,又發現了美與秩序。

郁達夫和同時代的五四文人一樣,深受浪漫主義的影響,他的悲觀主義和尼采、波特萊爾若合符節。他筆下孤獨、虛無、頹廢的人物又和屠格涅夫筆下的零餘者同出一脈,他對盧騷、璫生等人的喜愛,是因為他們和他自己一樣,是敏感而神經質的人,郁達夫在寫作與閱讀之時,也在尋找自我的認同(identification)。

郁氏作品中病態的人物可大別為兩類,一為身體上的病態,一為心理上的病態,然而兩類人物往往交相疊映,這是因為身心互為影響之故(psychosomatic)。郁氏小說人物中身體病態最明顯的是肺病患者,除了真實生活中如是之外,也是因為肺病在浪漫主義作家中被認為是一種靈魂的疾病,是文人熱情的展示。肺病患者每帶有的憂鬱的氣質因此也成為郁氏作品中人物心理疾病的特徵,這些孤獨而疏離的人,每每是社會的零餘者。而這兩種身心病殘的人,恰帶有濃厚的自傳色彩,雖然我們知道,小說不等於自傳,但我們仍可說,這些小說人物是郁達夫

44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71-76, 211-21 etc.

藝術化了的自我（artistic ego）。

評論者每將郁達夫小說視為頹廢與虛無，不知郁氏深受浪漫主義及悲觀哲學的影響，在頹廢中展現出進步的面貌，在悲觀中展現出生命的尊嚴和生存的壯美。

主要參考書目

- 郁達夫：《郁達夫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暨香港三聯書店，1982 年
- 張恩和：《郁達夫研究綜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年
- 素雅（李贊華編）：《郁達夫評傳》，上海：上海現代書局，1931 年
- 賀一波編：《郁達夫論》，上海：光華書局，1932 年
- 鄒嘯（趙景深）編：《郁達夫論》，上海：北新書局，1935 年
- 郁雲：《郁達夫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
- 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 年
- 曾華鵬、范伯群著：《郁達夫評傳》，廣州：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 年
- 張恩和：《郁達夫研究綜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年
- 劉心皇：《郁達夫與王映霞》，台北：大漢出版社，1978 年

The Pathetic Aesthetics of Yu Ta-fu's Novels

Chai, Jen-Nien *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Yu Ta-fu was a writer who exacted a great deal of influence to the future novelists. In his lifetime, he wrote many famous short stories, essays, diaries, prefaces and epilogues. Some critics even think that his achievement on traditional poetry is greater than any other genres of his creative writings. During his thirty years of literary activities, in addition to taking part in Creation Society, he was the chief editor of many magazines, translator of German and Japanese literatures. Important as he is, there are not many thorough studies on his writings.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delve into the pathological aesthetics in the novels of Yu Ta-fu and tries to rela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aesthetics and Yu's character and psyche.

Keywords : Yu Ta-fu, pathological aesthetics, autobiographical nove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